

网络舆情视域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研究

蒋晓丽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89)

【摘要】互联网技术和各类新媒体的开发使用使网络舆情生态日益复杂,高职院校在主流价值引导、舆情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通过优化意识形态工作顶层设计、提升意识形态管理水平、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大格局、构建网络舆情协同治理体系的思路,推动形成一套符合高职院校教育类型、契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更好地在网络舆情中提升高职院校风险防控效果。

【关键词】网络舆情; 意识形态; 风险防控

高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正经历着从注重应用技术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型阶段,其中以意识形态教育为核心的教育软实力的提升尤为关键。作为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群体,高职师生在互联网空间这一最大变量中见证着泛政治化的网络舆情的集散、发酵和延展,高职院校在全媒体背景下打造“又红又专”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网络舆情对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影响

网络舆情是高校意识形态的新型传播载体,高职学生是舆情生态中重要的生产者、传播者,在复杂的网络舆情场域中,大学生对网络舆情的认知程度和网络行为容易成为引发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

(一) 网络舆情对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正面影响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各类新媒体的形成和应用,拓宽了信息传播的范围,为学校师生选择议题、发表观点、讨论话题提供了更多可能,也改变了传统官方主导、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容易聚集更多社会的注意力。高职院校工作人员能在充分把握网络舆情状态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开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提升学生素养,巩固和壮大主流意识形态^[1]。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献力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关心社会需求的态度与立场,以及切实维护师生利益的决心和行动能够更好、更快地

被展示、被关注,充分展示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学校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示范力量。另外,网络舆情载体多样、内容开放的特点使各类社会群体都能够在网络空间中表达观点、提出疑问。借助网络空间,社会受众可以全面了解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当下现状及未来前景,表达对于未来职业教育的期待和对于成为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现实诉求。通过科学有效地运用网络舆情,高职院校工作者能更好地了解来自学生及其家长、社会群众、行业人士对于职业教育的真实诉求与关心关切。在国家全力支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当下,这些内容既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内容,扩大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和引导力,也为扭转大众对职业教育刻板认知、激发职业院校发展活力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 网络舆情对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的负面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内容展开,在学校宣传思想及舆论宣传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网络舆情具有碎片化特点,高职院校在招生宣传、顶岗实习、学生管理等某一局部或某事件出现的问题,容易产生“晕轮效应”使网络舆情蔓延至对该校教育管理及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讨论,引起网络舆情的全面爆发,使公众对于高职院校的刻板认知非但扭转反而加深,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不公平、不正确的言论容易被扭曲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价值观的判断,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严重时甚至会使网络舆情阵地失

守。另外，网络舆情是学生观点和情绪的集聚表达，非理性特点比较突出，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来源于所有社会成员对当下政治制度、权力结构、社会秩序的普遍认可、支持和拥护，是保证社会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和认知前提^[2]。在后真相时代，“非理性”大量繁荣，其表达出的观点往往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和对立性，师生情绪极易被裹挟其中，掀起网络舆情的二次甚至多次发酵，甚至使一些具有偏向性的观点逐渐尖锐化或者极端化。这些“极化”所产生的网络舆情极易演化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满，并经网络扩散传播后，使部分学生对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消极认知和不客观评判，为高职院校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增大了难度。

二、全媒体时代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引导面临的风险挑战

在传播主体多元、传播渠道多样、传播视野多维的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且“人人都有一只麦克风”，西方“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有所蔓延以及“泛娱乐化”“去中心化”等思潮蠢蠢欲动。作为各大意识形态阵营争夺的对象，大学生求新求变求异的特点，增强了网络舆情即时产生、态势难判的特点，加之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在价值引导、舆情风险管控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导致高职意识形态安全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一）多元价值观对主流意识形态渗透的冲击

媒介环境的“自我赋权”在改变信息流向的同时，也使得学生群体在意识形态知识传递和话语表达过程中成为主动参与的对话者、不同意见的表达者、不满过程的愤懑者，其中既有“意见领袖”，也存在大批等待呼应的“沉默群体”。他们成为网络舆情中的重要发声人，使高职院校话语权发生重构，加之学生群体价值观念处于鲜活与定性的重要阶段，容易受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热点问题的影响，尤其对被包装美化过的言论话语难以辨别，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有了可乘之机^[3]。另外，网络空间几何式传播方式造成了“信息泛滥”，舆情传播主体的多元，传播信息的琐碎、传播内容的多元、传播模式的多样等使网络舆情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点，网络空间的高自由度和开放性也为网络监管增加了难度，负面舆论和

消极情绪挤压着正面舆论空间，非主流话语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破坏了高职院校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干扰学生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对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带来了挑战。

（二）技术进步催生媒介形态变化加剧管控风险

数字化技术背景下，新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突破，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使万物皆媒介加速成为现实，声音、文字、图片、视频、弹幕、表情等传统信息表达得以融合，加速了舆情传播的智能化、网络化，在加大有效信息甄别难度的同时，也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风险。另外，在网络全球化背景之下，西方势力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侵犯，如根据用户上网偏好进行算法推荐，向用户精准推送信息，并在其中夹带意识形态相关内容，使一些错误思潮涌入网络舆论空间。另外，高职院校网络舆论管控技术和舆论引导水平较弱，“把关人”角色弱化甚至缺失，容易在招生就业、岗位实习、教育管理等方面引发舆情，爆发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除此之外，高职院校的网络舆情监测技术与相关设施匹配落后，也直接影响高职院校处理突发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的处置效果。

（三）高职院校风险防控和阵地建设的水平不足

从传播形式上看，一些高职院校开展的意识形态教育注重理论灌输和空洞说教，缺乏直接有力的阐释和引导，“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仍有存在，这种单调乏味的宣传既无法让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科学的认识，甚至让学生产生了抵触心理。从传播主体上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对高职学生的个性特点、思维方式、社交习惯等了解和把握不深，对于意识形态工作认识不透，存在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的现象，“网络红军志愿者”的数量匮乏，借助新媒体阵地进行议题设置能力有限。另外，当下高职院校逐步完善了以“两微一端”为核心，以课堂、讲座、论坛、社团为一体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但有些高校对新媒体传播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内容观点片面，错误表述和偏差认知隐藏其中。不仅如此，“网络慕课”“在线学习”等学生使用较多的线上授课平台未得到足够重视，利用大数据进行学生画像、行为异常预警等功能未被充分开发，敢于打好意识形态阵地主动仗的意识有待提升。

三、网络舆情视阈下高职院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

（一）优化意识形态工作顶层设计

坚持党管媒体的根本原则，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紧扣媒介属性特点及其社会责任，在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处发展的同时也要利用好新载体开拓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在打造线上线下两个“舆论场”中做好价值引领、打造网络文化育人品牌，坚持守正创新，壮大主流舆论阵地，传播中国好声音。另外，要进一步健全网络舆情研判会商、应急处置、舆论引导、风险评估、媒体管理等工作机制，不断丰富机制内涵，规范机制运行程序，注重将互联网思维贯穿于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落实，构筑高校网络舆情治理体系。

（二）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水平

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群体、传播技术发展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要加强学校网络文化建设，完善新闻信息审核发布制度，及时掌握校内师生自媒体动态，提升校内新闻媒体的受众黏性，并深入学生内部开展基础调研，在充分把握网络舆情传播规律与受众群体诉求的基础上建立本校分析系统和舆情应对“口径库”，做到对网络舆情危机及时发现、精准分析、高效处理。另外要充分运用信息革命的技术成果，以科技赋能构筑学校舆情预警防范机制^[4]。强化对各类舆情数据平台的使用，增强科技用网治网能力，完善舆情数据搜集、整理、报送的流程，以科学技术支撑数据全天监测和分级更新、综合展示，及时捕捉舆情传播各环节中的各类风险挑战，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舆情信息，提升网络舆情生态中主流舆论引领力。

（三）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大格局

要充分利用各类社交平台、门户网站、校园媒体等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理论传播，创新理论阐释手法，优化议题设置内容表达，提升媒介引导力，将主流意识形态输入到网络平台中，激活师生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同时要转变宣传思维，将对师生情感、观念的引导上升到与学校、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轨道上来，更多融合声音、动画、表情包等形式生动的网络素材，以生活化视角、网络化语言、年轻化方法讲好师生身边故事，以互联网思维增强对热点舆情事件的分析，挖掘网络舆情正能量，增强高职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形式的时代感和鲜活感，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空间。与此同时，也可通过培育学校大V等新型意见领袖，拍摄短视频、微电影吸引大学生进行话题探讨和正向价值引领，拓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

（四）构建网络舆情协同治理体系

舆情发生和传播的过程十分复杂且易引发“蝴蝶效应”，会对学校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高职院校需要建立起内外协调联动机制^[5]。一是主动成立校内网络舆情管理领导机构，形成由宣传、学工、招就、教学、网信等部门构成的多主体多元共治的组织构架，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加强舆情监督和管理，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积极把控主流舆论导向，有的放矢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开展效果。二是深化学校与校外机构的沟通，善于协调宣传、网信、政法等单位力量，探索社会机构多主体参与的舆论引导范式，探索形成政府、企业、学校、媒体、网民等多主体参与的综合共治格局，打造社会——网民——学校等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增强网络舆情生态治理的保障力。

参考文献：

- [1] 李桂平，程海威.5G智媒时代高校网络舆论传播的生态嬗变与多维应对[J].情报科学,2023.41(02):143-49+168.
- [2] 郑未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视角下网络舆情的应对[J].青年记者,2022(11):69-71.
- [3] 程桂龙，谢俊.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J].重庆社会科学,2020(04):121-130.
- [4] 方世南，徐雪闪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意见领袖作用研究[J].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87-96.
- [5] 张志安，聂鑫.互联网语境下意识形态传播的特点、挑战和对策[J].出版发行研究,2018(09):9-13.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媒体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网络舆情引导与应对研究”（项目编号：22XHsk-09）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蒋晓丽（1992—），女，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讲师，西航职院机关党总支，主要从事新闻传播、校园文化、网络舆情研究。